

内 容 提 要

内 容 提 要

法谚云：正义之实现，非仅在于实体，亦在于程序。对现代社会处于弱者地位的“上帝”们而言，提起国际产品责任诉讼，是他们对付位于遥远国度的侵害者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保护消费者权益，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全球性的任务。坊间有关国际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的书籍日见增多，表明消费者的权益正日益得到重视，固值庆幸，然而，除了产品责任实体法上的保障，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更有赖于程序上的支持和保护。而此问题恰恰常被学者们忽略了。有鉴于此，在导师的推介之下，我选择了国际产品责任的诉讼问题作为我的硕士学位论文，试图对与国际产品责任诉讼程序有关的法律问题作一个探究和认识。

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分为六章。

第一章是有关国际产品责任诉讼的管辖问题的比较与认识，其中主要针对各国对国际产品责任诉讼的管辖权确定原则、由此产生的管辖权冲突等问题及其解决途径进行一番比较，还对美国长臂管辖权在国际产品责任诉讼中的应用进行了述评。

第二章对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采取的国家限制豁免制度对国际产品责任诉讼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一定的研究与探讨。

第三章中论述了国际产品责任诉讼中可能出现的当事人问题，并对其权利、责任进行比较研究。

第四章主要论述传统侵权行为法律适用规则应用于现代国际产品责任诉讼时产生的问题和各国法律及国际条约所采取的解决途径。

第五章对原告提起国际产品责任诉讼的各种可能的不同诉因之下的举证责任进行比较论述。

第六章对国际产品责任诉讼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进行比较与研究，主要是关于国际产品责任诉讼判决中惩罚性赔偿内容的承认与执行问题的比较和认识。

在本文的写作中，作者主要运用了比较和分析归纳的方法：1、对各国不同法律制度、司法实践和一些理论进行比较，认识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各国的不同

解决办法。2、在比较中注重分析,以达到正确认识国际产品责任诉讼中出现的冲突等程序性法律问题的目的,同时通过各国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分析以探求正确的解决途径。3、在比较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归纳,试图总结各国和有关国际条约的经验,发现我国法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为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借鉴。4、本文主要就国际产品责任诉讼中相关法律问题的比较与研究,但并不局限于这一主题,而力求在探讨这一问题的同时对各国民商事诉讼法律中存在的相关及类似问题作一简略的探讨,为将来从事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关键词: 产品责任法 产品责任诉讼 程序法

引 言

如今，产品的跨国生产、销售和人员的跨国流动已经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随着经济发展的进一步国际化，这种情形还将更趋普遍和广泛。由于商品和人员的跨国流动，必然带来一国产品在其他国家、对他国消费者造成损害的结果以及由此引起的国际产品责任诉讼问题：一、产品生产流程中的设计、零部件生产、组装等不同工序位于不同国家或者组成产品的各个部分来自不同国家等情况均足以引起国际产品责任问题。跨国公司出于商业利益考虑，其产品大都在不同国家生产、组装成型并销往世界各国市场。现代经济中还出现了一些较为特殊的生产方式如跨国授予许可证、授予商标等，它们也可能引起国际性产品责任问题。二、现代化的销售途径使任何产品都可能进入生产者所在国家之外的他国市场，甚至行销几十、上百个国家。因特网的出现更使信息和产品的跨国流动更为方便和频繁。三、在人员的跨国流动中，一国消费者可能在他国通过购买、获赠等手段获得来自其他国家甚至可能是其本国的产品，而后他可能在他国进行消费、使用或带回本国消费、使用之，其因此的受害地点完全可能在本国或其所在的外国，甚至可能在他（她）途经的第三国。概而言之，国际产品责任诉讼的出现乃是商品生产、销售国际化的必然结果。

现代化社会中，相对于强大的生产商和销售商而言，消费者始终处于一种微乎其微的弱者地位；一旦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他们微弱的力量根本无法与强大的对手作任何抗衡；提起国际产品责任诉讼，是他（她）们所能寻求的最终和最有力的公力救济手段。由产品引发的侵权责任和诉讼中的诸多法律问题远较其他侵权行为复杂，因此，大多数国家出于对消费者公平保护的目的，纷纷建立了有别于其他侵权法律的产品责任实体法律制度和诉讼制度，一些国家（如美国）甚至将产品责任诉讼制度区别于其他诉讼制度、单独列为诉讼种类之一。但限于各国的发展水平、法律文化环境、社会制度的区别，各国的产品责任实体法律制度差别甚大，更由于国际产品责任诉讼本身具有连结因素众多，因此，在发生国际产品责任诉讼时不可避免发生当事人选购法院（Forum shopping）的情形。各国在国际产品责任诉讼领域亦均尽量扩大本国法院的管

辖范围并力求适用对本国当事人有利的法律^①，更有一些国家在此问题上表现了其惯有的法律沙文主义倾向，无视他国法律主权，在此领域一再扩大其管辖权，并视本国法律为主尺。而且，随着高科技在现代化产品生产中的应用和产品流通手段多样化、流通范围全球化，传统的举证责任和法律适用规则在应用于国际产品责任诉讼中产生了一定的问题。因此，一旦消费者提起国际产品责任诉讼，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包括管辖权、法律适用与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以及各种可能的豁免事由等国际民商事诉讼法律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各国均在产品责任诉讼领域对各种传统法律规则进行了一定的变革，国际社会也进行了多种尝试，努力通过缔结统一的多边条约以解决各国在管辖权、法律适用等方面的冲突，一些发展水平较为相近、具有政治、经济一体化趋向的国家间（如欧共体）还试图使产品责任法律在实体上走向统一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但由于国际产品责任实体和诉讼的法律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而且由于其涉及诸多生产商和销售商的切身利益甚至各国自身的经济利益、加之其他种种因素的干扰，除欧洲共同体各国在统一立法上获得一定进展外，国际社会的努力尚未取得显著的成就，这一领域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发展。

由于国际社会尚未为解决国际产品责任诉讼中存在的诸多法律问题提供完善的解决途径，与国际产品责任诉讼有关的法律制度仍散见于各国的国内法律规定和一些国际条约中，因此，通过对各国法律规定和一些相关国际条约进行比较、总结和归纳以探求正确、妥适的解决问题之途径不啻为一项必须的任务。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对各国法律和相关国际条约中存在的有关国际产品责任诉讼管辖权、当事人、法律适用、举证责任、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等诸多问题进行比较，并对一些国家和国际条约已有的一些法律制度和做法进行探讨和评价，以求为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正确解决有关法律问题、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提供一种参考和借鉴。

① 曹建明著：《国际产品责任法概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93 页。

第一章 国际产品责任诉讼的管辖问题

在原告提起国际产品责任诉讼之初，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受诉法院是否具有对案件的国际民事管辖权问题。国际民事管辖权，系指在世界范围内，依据一定的连接因素，决定各国法院间的法院管辖权问题，即依照一定的规则确定哪一类涉外民商事案件应由何国法院管辖裁判。它系以国际社会为出发点确定何国法院具有管辖权，不同于确定本国哪一法院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内国民事管辖权^①。按常理，这些规则应属于国际法的范畴，但由于习惯国际法并未形成这些规则，因此只能在各国的国内法或双边、多边条约中体现，尚未形成完全统一的国际民事管辖权规则。国际民商事纠纷中，只有当受诉法院依据其本国法律或本国参加的条约规定的国际民事管辖权规则确定其对案件具有管辖权后方可对案件进行审理，诉讼才能得以继续进行。而且，诉讼管辖权的确定还直接影响实体法律的适用、从而影响案件的审理结果^②，并影响受诉法院作出的判决在其他国家的承认与执行^③。从各国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看，法院确定本国法院对国际民商事纠纷的国际民事管辖权一般都依据本国与案件相关的一些连接因素作出，包括当事人的国籍、当事人的住所地、当事人的行为地等。毫无疑问，国际产品责任诉讼属于国际民事诉讼的一个种类，因此，各国有关确定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规则一样适用于国际产品责任诉讼。

第一节 大陆法系国家的管辖权及其依据

一、一般管辖原则

大陆法系国家中在确定国际民事管辖权方面主要存在不同的几种做法：

（一）以国籍作为确定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连接因素：法国、意大利等国为代表的拉丁法系国家主要以当事人的国籍所在地作为管辖权依据，在这方面以法国最为显著。基于法国国民受法国主权支配、同时受法国主权保护的理论，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14、15条规定，契约债务的当事人中有一方为法国国民的

① 林庆苗、陈荣宗著：《民事诉讼法》，（台）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93页。

② 徐崇利：《中外民事管辖权冲突的产生及其解决方法》，载《政治与法律》1993年第5期。

案件,均由法国法院管辖^①。虽然该两条规定明确仅限于契约债务,但实践中法国法院将案件管辖权扩大到除了涉及国外不动产案件之外的所有以法国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案件。相对应地,它们在司法实践中排除内国法院对当事人均为外国人的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因此,国际产品责任诉讼中,只要有一方为该国的国民或者在该国登记注册的企业,这些国家认为便可据此行使其管辖权,而不考虑产品系在何处生产、在何处被购买、损害发生于何处等事实。采用这种做法的还有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但是,这种国际管辖权由于其明显的过度性,遭受到其他国家和一些国际私法学者的反对,1968年欧洲共同体《关于在民商事事件中管辖权和判决执行的布鲁塞尔公约》中明文规定在该公约缔约国之间予以废止。在司法实践中,法国法院也逐步以判例改变这一情形,将决定国内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一些标准如被告住所地标准等类推适用于国际民商事案件中,以至于目前在法国法院中类推适用已居于主要地位,而依国籍决定国际民事管辖权的部分反而已退居次要地位^②。(二)以被告的住所地、惯常居所地及法人管理中心作为确定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连接因素:德国及其他仿效德国法律的奥地利、日本、希腊、泰国等国家一般没有关于国际管辖权的成文立法。因此,它们通常将民事诉讼法中的国内地域管辖规定扩大适用于国际民商事案件,依被告人的住所、居所(或惯常居所)以及法人的管理中心等连接因素决定本国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③,将其作为本国法院对案件进行管辖的原则,以国籍作为国际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例外。除了专属管辖案件之外,其他案件均依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只有婚姻等涉及身份的案件才以国籍作为管辖依据。^④(三)瑞士模式,瑞士的国际民事管辖权制度既不同于法国法过于强调属人原则,也不同于德国法过于强调属地原则,而是更侧重于管辖权的国际协调。依据瑞士于1987年12月颁行的国际私法规定,在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下,管辖权应属于被告住所地的瑞士法院或主管机关。同时,根据当事人或争议事项与瑞士某一地方具有足够密切的联系,规定了一些特别的管辖权作为普通管辖权的补充。为避免内国法院判决无法得到其他国家法院的承

① 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0页。

② 李浩培、吴传颐、孙鸣岗译:《法国民法典》,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页。

③ 李浩培著:《国际民事程序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④ 刘仁山主编:《国际民商事程序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⑤ 韩德培主编,前引书,第624-625页。

认与执行, 该法还对内国法院的国际民事管辖权进行一定限制^①。

二、特殊管辖依据

(一) 侵权行为诉讼中以侵权行为地作为确定管辖权的依据

国际产品责任诉讼虽可能存在因违反担保引起的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两种诉因, 但是, 从各国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的发展现状看, 各国普遍已承认产品责任主要是一种侵权责任, 契约上双方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已不再是构成负担责任的要件^②。一般而言, 各国均允许依据国际侵权诉讼的规则确定国际产品责任诉讼的国际民事管辖权。出于保护各国的本国国际侵权行为受害者或侵权行为地的公共利益, 在国际侵权案件的管辖中以侵权行为地作为管辖依据, 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管辖权原则^③。但各国法律中规定中对侵权行为地内涵的理解则有所不同: 1) 有的国家规定以加害行为地作为侵权行为地。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32 条则规定, 因侵权行为发生的诉讼, 行为实施地的法院具有管辖权。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 48 条第一款也采用这一主张; 2) 有的国家则主张, 应以损害发生地为侵权行为地。这主要是一些英美法系国家的观点, 例如美国 1971 年《冲突法重述 (第二次)》第 377 条即采此种观点^④。但这些国家在采取管辖权方面主要依据其传统的“实际控制”理论, 侵权行为地对其管辖权的影响不是很强烈, 主要通过一些变通的方式获得 (见下文)。这些国家中对侵权行为地的理解主要涉及法律的适用问题, 将在本文第四章中论述。3) 有的国家主张它既包括行为实施地也包括损害发生地。法国 1976 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针对侵权诉讼规定, 侵权行为发生地及侵权损害发生地可作为管辖权的选择管辖依据; 瑞士《国际私法》第 129 条规定, 在被告于瑞士既无住所、也无惯常居所或营业所的情况下, 侵权行为事件的国际管辖权属于侵权行为实施地或效果发生地的瑞士法院。另外, 依据日本民事诉讼法第 15 条的规定, 日本法院可以对伤害发生于日本的产品责任案件行使管辖权^⑤。

(二) 其他特殊管辖依据

① 参见徐宏著:《国际民事司法协助》,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273 页。

② 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 3 卷之《产品责任现况之检讨及其发展趋势》,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188 页; 美国《侵权法重述 (第二次)》的报告人 (Reporter) John W. Wade 教授 “On the Nature of Strict Liability for Product”, 44 Miss. L.J.825(1973)

③ 周海荣著:《国际侵权行为法》,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73 页。

④ 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新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314 页。

随着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许多企业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在其他国家设置了分支机构、办事处、代表处等以达到便于其生产、销售和推介产品等目的。一家企业在别的国家中存在一定财产,更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一些国家出于扩大本国管辖权的需要,在本国法律中规定将被告的分公司、办事处和代表处所在地或财产所在地也作为确定本国法院具有国际民事管辖权的依据,这对作为国际产品责任诉讼被告的企业而言是十分不利的。比如日本就存在这种情形。该国民事诉讼法并未就有关国际民事管辖权做专门的特殊规定,有关的国际民事管辖规则大多通过一些司法判例体现。司法实践中,日本最高法院曾在1981年的“*Malaysian Airlines System Berhad v. goto 案*(一般称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案)”中依据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在东京设有一家办事处的事实行使对该案的管辖权。这一做法在该国国内受到了极大的批评,学者甚至认为,日本法院这种将确定国内管辖权适用于国际民事案件的做法如果被应用于每一类似的案件,对被告是极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实践中,一些法院也逐步改变这种做法,东京地方法院在1983年的 *Mukoda v. Boeing Co.* (一般称为远东航空公司空难案)一案中,除了从该案证据的取得、司法协助途径的存否等方面进行分析之外,法院认为,虽然波音公司在日本存在办事处,但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在日本审理该案将有违诉讼的公平原则,最终裁决驳回该案。这一观点得到普遍接受并逐渐取代了日本最高法院的前述判例确定的规则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主流做法。从晚近发生于1997年的 *K.K Family v. Miyahara* 案来看,日本最高法院最终接受了这一观点作为是否行使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裁量原则^①。将被告财产所在地设定为确定本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连接因素则出现于不少国家,尤其是德国法体系的国家立法之中。据学者统计,近代,至少有14个国家采用这一管辖规则,其中还不包括先对财产扣押而后行使管辖权的国家^②。我国在民事诉讼法中有关涉外民事诉讼管辖专章中也接受了上述做法,将被告在中国有分支机构、办事处、代表处或存在可供扣押财产作为我国法院行使国际民事管辖权的依据,存在一定的过度性。

① 刘静著:《产品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9页。

② See Hideyuki Kobayashi and Yoshimasa Furuta, Product Liability Act and Transnational Litigation in Japan,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34, Winter 1999, p106-107.

③ 见徐崇利:《被告财产所在地涉外民事管辖规则的适用问题探讨》,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4期。

第二节 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

传统上,英美法系国家将对案件的管辖区分为对人管辖和对物管辖(在美国还存在准对物管辖)。由于对物诉讼系应用于某些确定财产权益的案件之中,与国际产品责任诉讼没有什么联系,因此,国际产品责任诉讼的管辖权问题主要出现在有关国家的对人管辖制度中。对人诉讼管辖中,英美法系国家均采取“实际控制原则”,只要在法院所在国能有效向被告送达传票,法院即取得案件管辖权,而不论案件当事人注册地、经营地是否存在于该国。这主要与英美普通法早期的民事审判习惯有关:在英美普通法早期,民事诉讼是从对被告的人身拘捕开始的,被告被关押至案件审理完毕,后来,实际的人身拘捕被象征性的拘捕----传票所代替。因此,历史上,英美普通法认为:对被告的对人管辖权主要是法院司法强制力的一个功能,如果法院能够拘捕某个人,则此人隶属于该法院的管辖权。而传票的送达恰恰表明,如果必要,被告可能被拘捕,即使被告是一个对管辖权持有异议的非当地居民,当他出现在法院辖区,并被以合法的程序传唤时,他也隶属于该法院的对人管辖权。据此,英美法系据以确定对人管辖权的传统基础即被告与法院的三种联系:居所或住所在法院的辖区、被告放弃管辖权异议、被告出现在法院辖区得以树立(美国最高法院在著名的 *Pennoyer v. Neff*^①一案中甚至宣布,这三种传统基础是宪法允许采取管辖权的仅有基础^②)。同时,为避免管辖范围过于宽泛,这些国家的法院一般采取“不方便法院”(或方便法院)等原则以决定法院是否保留案件并继续进行审理。

针对国际侵权诉讼的特殊情形,英国于1852年《普通法诉讼程序条例》第18条、19条给予该国法院以在国外送达传票的通知的自由裁量权,规定法院可自由裁量行使对被告的自承管辖权(*assumed jurisdiction*)。据此,在国际产品责任诉讼中,法院可以依据其对侵权行为地的理解,在认为侵权行为地在英国境内时,依原告的请求对位于国外的被告送达传票,从而获得这种管辖权。

但是,英国法院在认定何种情况下侵权行为地位于英国,即它们对“侵权行为地”概念的理解上则有一个发展过程。1944年的 *George Monro Ltd. v.*

① 95 U.S.714(1877).

② (美) Robert C. Casad 著,刘新英译:《论美国民事诉讼中的管辖权》,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4期。

American Cyanamid and Chemical Corp.案^①体现, 审理该案的英国上诉法院对国际产品责任侵权行为地的理解仅为“侵权行为发生地”它认为,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损害在哪里发生, 而在于造成损害的过错行为在哪里发生, 因此, 侵权行为地仅指即产品的生产地, 由于该案的产品在外国制造, 英国法院对此没有管辖权。但是, 英国枢密院在 1971 年与前案件情况类似的 *Distiller Biochemicals Co. Ltd. v. Thompson* 案中变更了这种观点, 认为, 最高法院关于侵权行为的管辖权规定包括三种情况: 1、全部诉讼原因均在受诉地发生; 2、最后事件即损害的发生, 成为关键因素; 3、造成原告提起诉讼的原因的被告行为地发生在受诉地。据此, 产品的最后销售地、使用和伤害发生地均应被视为国际产品责任的侵权行为地。这表明其在产品责任中开始倾向侵权结果(伤害)发生地, 此后的判例也朝这一方向发展。1982 年, 英国上诉法院在 *Castree v. E.R. Squibb Ltd.*案中, 则又强调应从实质上注意侵权行为发生于何地而不仅仅是最后事件发生于何地, 该案中造成损害的实质性过失不是产品有缺陷, 而是被告未做适当警示便将产品投入英国市场, 因此, 英国是侵权行为地, 可受理这一案件。1983 年英国最高法院规则第 11 号规则(一)进行了修改, 规定如果侵权行为地如发生在英国辖区内, 则英国法院对案件具有裁量管辖权。此后, 英国法院将侵权行为地界定为既包括侵权行为发生地, 也包括损害结果发生地, 并强调, 对此具体应当观察各种事件产生的结果, 并探究实质性的诉讼原因在何处发生进行确定。可见, 英国法院已经改变了过去主张的英国法院对在外国生产的产品在英国造成损害没有管辖权的观点, 对侵权行为地的理解逐步宽泛和灵活, 以满足不断变化的案件实际需要。

美国由于存在联邦法院与州法院两种司法体系, 因此在管辖权问题上显得较为复杂, 有关联邦管辖权与州管辖权的区分属于内国法院之间的管辖权区分, 在本文中不拟进行论述。但是, 无论是州法院或联邦法院在行使对被告的对人管辖权时, 均必须符合两个条件: 一、必须具有立法授权法院对被告的管辖权; 二、这种授权必须符合美国宪法所规定的正当程序条款要求。只有同时满足上述两个要求, 法院方可行使对人管辖权^②。由于美国通过立法对法院的管辖权授权范围十分广泛, 因此, 一些美国学者在进行有关美国法院对国际民事诉讼的

① 曹建明著:《国际产品责任法概论》,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83-84 页。

② See *Omni Capital Int'l v. Rudolf Wolff & Co.*, 484 U.S. 97, 104(1987); C. Wright & A. Miller, *Federal Practice and Procedure* § 1063(1987). R. Swanson, *The Application of Federal Rule.*

管辖权研究时,将其划分为“一般管辖权 (General Jurisdiction)”和“特殊管辖权 (Specific Jurisdiction)”^①。一般管辖权允许法院对任何被告、任何诉讼请求均行使管辖权。但依据正当程序要求,无论诉讼的发生是否与法院地具有何种联系,只有当被告与法院地具备一定的较为密切、持久的联系如国籍、住所或注册等,法院行使一般管辖权才具备相应的合宪性。相对应的,“特殊管辖权”则仅允许法院在下列条件下行使管辖权:被告与法院地具备一定联系、但该联系尚未达到行使一般管辖权所要求的联系程度,且诉讼系基于被告与法院地的这种联系而提起^②。一般管辖权的管辖依据包括:1、被告的国籍、住所或居所 (Nationality, Domicile, or Residence); 2、法人基于从事商业的注册或登记行为 (Incorporation or Registration to Do Business); 3、被告同意接受管辖或放弃对管辖权的抗辩 (Consent or Waiver); 4、被告在法院地“出现”或从事“持续而系统的商业行为” (Presence or Continuous and Systematic Business Activities Within the Forum), 最高法院在 Perkins v. Bengue Consolidated Mining Co.^③一案中创立了这一标准。目前,许多州的法律给予了法院这种管辖授权。但是,由于“出现”显然带有很大的模糊性、“持续而系统的商业行为”也缺乏必要的明确标准,所以也有一些法院认为,这一条件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基于在法院辖区无住所的被告与法院地持续的商业联系行使管辖权的情形极少出现^④; 5、被告在法院地短暂出现中受到的送达 (Personal Service During the Transitory Presence of the Defendant Within the Forum); 目前,这一理论受到的批评日益众多。《外国关系法重述 (第三次)》将这种管辖权视为违反国际法的非法管辖^⑤。许多法院也基于正当程序条款抵制、拒绝这种管辖^⑥。只要被告与法院地具备上述联系,法院即可对其行使管辖权,而无论引起诉讼的行为发生于何处、与法院地是否有任何联系。有关特别管辖权的问题则相对要比较复杂,将在下文中专门进行讨论。

① 一般认为,这种划分方法最早由 von Mehren 和 Trautman 发表于 79 Harv. L. Rev. 1121, 1136-64 (1966) 的 Jurisdiction to Adjudicate: A Suggested Analysis 一文中提出的,此后为许多学者所接受,美国最高法院在 Helicopteros Nacionales de Colombia, S.A. v. Hall, 466 U.S. 408, 414 (1984); 和 Calder v. Jones, 465 U.S. 783, 786 (1984) 等案件中也接受这一分类进行分析。

② 同前注论文及案例的判词。

③ 342 U.S. 437 (1952)。

④ See Gary B. Born, International Civil Litigation in U.S. Courts: Commentary & Materials, 3d Edi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6, p. 104.

⑤ See Restatement (Third)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21, Reporters' Note 4 (1987)。

第三节 一个特殊的问题：美国法院的长臂管辖权及其在国际产品责任诉讼中的应用述评

简要而言，“长臂管辖理论”的内容指在不违反正当程序原则的基础上，即使被告的住所地不在法院所在的州，但和该州具有某种最低限度的联系，而且案件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与这种联系有关，该州即取得对这一诉讼请求的管辖权^①，即前文所述的“特殊管辖权”。一般认为，1945 年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 *International Shoe Co. v. Washington*^② 一案中确定的“即使被告并未在法院辖区内出现，但由于它与法院地具有某种最低限度联系，这一联系使案件的审理不违反传统的公平和实质正义”即“最低联系（Minimum Contacts）”标准系长臂管辖理论确立的标志。之后，这一理论在一系列案件中被遵循和发展。50 年代后，开始有一些州通过了长臂管辖法。目前，美国各州都已通过制订成文法（或法院规则）的形式赋予了本州法院对在本州无住所的被告（包括外国被告）的对人管辖权。在这些法律或规则中大部分赋予了本州法院对居住于外州甚至外国、但与本州具有特定联系的被告的长臂管辖权。尽管各州对长臂管辖权的规定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的立法模式有两种：一是有些州将宪法第 14 条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并入长臂法律之中；二是不少州已经通过的长臂管辖法律中或多或少采用分类列举的方式规定了本州法院对外国被告行使长臂管辖的具体情形^③。在联邦法院体系，美国国会并没有制订适用于联邦法院体系的统一长臂管辖法律，但联邦法院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规则 4 第 11 款第一项 A 的授权，得以借用所在的州的州法院的管辖权力，包括长臂管辖权力。

在美国法院提起的国际产品责任诉讼占据了该国国际民事侵权诉讼的很大比例，实践中，美国法院在国际产品责任诉讼案件中大量采用长臂管辖确定其管辖权，有关的长臂管辖理论在国际产品责任诉讼中也不断得到应用和发展。针对国际产品责任诉讼的特点，美国法院还发展、创设了一些特殊的理论和标准，其中最为著名的应属“商业流通环节原则（The Stream of Commerce Doctrine）”。

① See Weintraub, *An Objective Basis for Rejecting Transient Jurisdiction*, 22 Rutgers L.J. 611 (1991).

② See David D. Siegel, *Conflicts in Nutshell*, 2nd ed., West Publishing Co. 1994, p. 59.

③ 326 U.S. 310 (1945).

④ See Gary B. Born 前引书, p. 68.

联邦最高法院在 1958 年的 *Hanson v. Denckla*.^① 案中对起源于 *International Shoe Co. v. Washington* 案的“最低联系”进行了限制，创设“有目的利用 (Purposeful Availment)”标准，即只有当“被告是有意地作出某种行为，以获取在诉讼所在州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进而得到该州法律上的利益与保护”因此种联系产生的诉讼，法院才具备长臂管辖。这种限制的出现，无疑对各州法院试图对产品责任案件中的外州或外国制造商行使长臂管辖权造成了障碍，因为缺陷产品在法院地出现的原因往往并不是制造商自身行为的结果，而是一些进口商、批发商等一系列中间商的商业行为造成的。为了突破这种限制，州法院创设了所谓“商业流通”原则，即如果制造商有意将其产品投入某一商业流通渠道之中，并清楚该商业流通渠道将使其产品在法院地所在州的市场上出现，则该制造商应对因这种产品在任何地方引起的产品责任服从该州法院管辖。该原则于 1961 年由依利诺斯州最高法院在 *Gray v. American Radiator & Standard Sanitary Corp.*^② 案中确立，之后迅速被大多数法院接受，并应用于国际产品责任诉讼中^③。

1980 年，美国最高法院在著名的 *World-Wide Volkswagen Corp. v. Woodson*^④ 案中针对俄克拉荷马州法院以被告能够预见在纽约州出售的产品在该州被使用的可能而采取管辖权的说法再一次进行了限制，它认为，单独的被告预见到其行为将对法院地造成影响并不能满足“有目的利用”联系的标准，“对正当程序的分析至关重要的这种可预见性，不仅仅是某产品出现于法院地州的可能，更应当是被告的行为及被告与法院地州的联系使其可能更合理地预测到他将在那里卷入诉讼。”由此，将被告对诉讼可能于法院地提起的“可预见性”也作为长臂管辖的限制要件之一。但最高法院在该案中并不反对商业流通理论，相反，它认为正当程序并不妨碍法院“对一家将它的产品投入商业流通渠道并希望被法院地的消费者购买的公司行使对人管辖权”，“如果制造商或分销商的产品销售不是一个简单的孤立现象，而是其直接或间接使其产品进入其他州市场的努力的结果，如因这一产品导致其所有人或他人伤害，则他们服从于任何

① 357 U.S.235(1958).

② 176 N.E. 2d 761(Ill.1961).

③ 较著名的如 *Mccombs v. Cerco Rentals*, 622 S.W.2d 822(Tenn.Ct.App.1981).

④ 444 U.S.286(1980).

州法院的管辖权就不是不合理的”。^①

在 *Asahi Metal Indus. Co. v. Superior Court*^②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再一次遇到了商业流通原则问题。9 名法官对适用这一原则无法达成多数意见，其中以 O'Connor 为首的 4 名法官认为，单纯依据被告将其产品投入商业流通并知道它们将被组装到摩托车上在法院地出售不能构成“有目的利用”联系的条件要求，表明他们对“商业流通”理论基本持反对态度；以 Brennan 法官为首的 4 名法官则认为，被告将其生产的零配件投入国际性的商业流通渠道并明知它们将长期在法院地的市场上出售，因此，法院具有对其管辖权。Stevens 法官则不赞同上述任何一种意见。这种情形导致下级法院在适用这一原则上开始出现较大不确定性^③，一些法院倾向于前者，而另一些法院则赞同后者的观点。但是，由于下级法院不可避免受到最高法院在 *World-Wide Volkswagen* 一案中所体现的态度的影响（该案中，最高法院似乎将商业流通理论视为是一种应用于针对可预见其产品在法院地州销售的制造商提起的诉讼中作为一项行使管辖权能够满足“有目的利用”联系要求的工具），因此，总的来说，以赞同“商业流通”理论者居多。

较晚近发生的 *Gould v. P.T. Krakatau Steel*^④被视为是继 *Asahi* 案之后对“商业流通原则”的又一次考验。该案中，一家印尼钢铁公司出口了一批钢材给美国的一家公司，该美国公司将其中的 3000 吨线钢运至位于堪萨斯州西孟斐斯(West Memphis)市的一家钢铁厂。原告是钢铁厂的一名工人，在开拆钢材时受到伤害，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获得赔偿。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与堪萨斯州的联系过于微弱，不足以行使管辖权，驳回了诉讼。原告上诉。二审法院在分析原告提出的一系列所谓连接因素之后，专门针对产品出现于法院地这一事实是否构成法院管辖依据进行了论述。法院认为，“被告将产品投入国际商业流通渠道并不是有意地直接针对堪萨斯州，被告与堪萨斯州发生联系系由于美国购买钢铁的那家公司偶然性的将被告的产品带入堪萨斯州，虽然被告可能预见到其产品将进入美国市场，但基本上没有理由认为被告会合理地预见到它将在堪萨斯州法院被起诉。最重要的是，被告仅仅是和美国的买家做成了一笔生意，

① See Gary B. Born, *International Civil Litigation in U.S. Courts: Commentary & Materials*, 3d Edi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6, p125.

② 480 U.S. 102(1987).

③ 张茂著：《美国国际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6 页。

④ 957 F.2d 573 (8th Cir.1992).

这一事实和美国的买家将线钢有意地运入堪萨斯州的事实是完全独立的,因此,被告对其产品进入堪萨斯州的预见是如此薄弱,并不能满足“有目的利用”堪萨斯的法律和保护的标准”。据此,法院认为不应对被告行使管辖权。这一论述基本上包括了上述商业流通原则和有关限制要件的一些理论。

此外,在 World-Wide Volkswagen 一案中,最高法院的“正当程序”分析中有关“合理性 (Reasonableness)”要求在长臂管辖权应用于国际产品责任诉讼的问题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要求法院在将长臂管辖权应用于国际产品责任诉讼中应对一系列因素进行分析,包括被告所受的负担、原告的利益、法院地的利益以及其他州的利益等。由于国际产品责任诉讼中被告所承受的负担远大于国内民事诉讼、还可能影响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造成上述因素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因此,美国法院在进行正当程序要求的合理性求证时颇为困难。在 Asahi 一案中,法院基于行使管辖权不符合合理性的要求认为不可行使管辖权并为此提供了一些原则性的意见,但下级法院却仍为此问题所困扰,并作出了一些完全不同的判决^①。

此外,在与商业流通理论有关的 Mccomb v. Cerco Rentals^②案及 World-Wide Volkswagen、Asahi 两案中法院进行的正当程序条款分析中,还涉及一个地理因素与“有目的利用”联系之间的关系问题,在 World-Wide Volkswagen 案中,被告因为具有与法院地足够的、符合宪法正当程序要求的联系,因此这一问题显得不很突出。但在类似 Mccomb 案中被告将产品(起重机)出口至美国、再由美国的公司出售他人带入法院地使用,在使用中发生伤害的情况下,问题则显得较为复杂。该案中,被告的产品只在法院地以外的其他几个州销售,并未在法院地市场上出现。法院认为,虽然被告并没有直接将产品投放至法院地市场,但它将产品投入流通的行为本身足以表明它可以合理地预见到根据正常的商业流通,产品将在销售地以外的其他州被使用并可能发生伤害,引起诉讼,据此,法院行使了管辖权。这实际上已经比商业流通理论更进了一步,根据这种理论,美国法院几乎可以对世界上任何一家制造商行使管辖权。

目前,在联邦法院借用长臂管辖理论的情形下一种以“国家联系”扩大化地代替法院借用的州长臂管辖理论中的“州联系”的倾向日益明显,这种做法

^① 见 Gary B. Born 前引书,第 125-126 页,在 126 页注解部分列举了 1985-1994 期间对此问题作出的 7 个不同判例。

使联邦法院得以对那些与其所在的州没有联系、但与美国存在联系的被告行使管辖权，片面扩大了联邦法院的长臂管辖权。

从以上长臂管辖权在国际产品责任诉讼中的应用的大体情况看，它基本上沿着一条扩张—限制—再扩张的曲线发展。由于它的适用受到正当程序条款中若干条件的约束和由此衍生的一系列包括最低联系、有目的利用、可预见性等限制条件的影响，法院为扩大管辖不得不创设一些诸如商业流通原则等理论作为行使管辖权符合上述各种限制条件，从而符合正当程序要求的依据。但是，由于种种限制条件与由此产生的对策性理论本身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随意性，法官存在的自由裁量空间过于宽大，导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点也应引起我们在研究中加以适当的注意。从本质上说，美国法院对本国国际民事管辖权历来持一种扩张的态度，尤其是当原告为美国国民时，出于保护本国国民的利益，这种倾向更是明显，这对外国的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是十分不利的。此外，由于美国法院经常选择法院地法作为审理案件的准据法，这两种因素的结合造成对外国被告的极大不利。在产品责任法领域，一些美国学者一再声称美国的产品责任法是世界上最完善的产品责任法，有的甚至认为，美国法院对国际产品责任诉讼管辖权的扩张有助于其他国家改进、完善其本国的产品责任法^①。不可否认，美国是产品责任制度的发端国家，对世界产品责任法的发展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但决不能以此作为其无视外国司法主权、不断扩大本国法院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籍口。还应当指出的一点是，由于各国法院在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中一般必须审查判决作出法院的管辖权，在这一审查中，并不完全依照请求国的法律，或多或少对其管辖权进行限制，而基于美国法院行使的长臂管辖权作出的判决在实践中几乎不可能被别国承认与执行。

第四节 国际产品责任诉讼的管辖权争议及协调

国际产品责任诉讼具有主体相对多样和行为所涉地点多元的特征。例如，在有关当事人住所地方面就可能存在：原告国籍国、原告的住所地、被告注册地、被告主要经营地等，在被告注册地和经营地上又可能存在生产商的注册地

^① 622 S.W.2d 822(Tenn.Ct.App.1981).

^② See Warren Freedman, Product Liability Actions by Foreign Plaintiffs in the United States .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 1988,p3.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